

民国浙江通志局初议

赵鹏团

提 要：民国初年，由于“民史观”的兴起，新方志受到社会普遍关注。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在文化的旗帜下，积极延揽清室旧人，先后设立的国史、清史两馆对地方通志纂修起到了引领和指导作用。《浙江续通志》在中央政策与学术双重引导下承旨开局，以师友、姻亲、同年、同乡等关系为纽带，组建起以沈曾植为首的清室遗民纂修团队。他们与中央两馆、兄弟省份志局声气相通，成为安置耆旧、排斥共和的阵地。军阀政策和遗民文化使这部续通志稿成为旧体志书在民国的延续，背离了民国初年方志热潮的初衷。与此同时，通志局局务踟蹰、人事纷繁、寄食情况较为明显，客观上给纂修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

关键词：民国 浙江通志局 军阀政策 遗民文化

民国3年（1914）至民国12年间^①，浙江设立通志局，聘嘉兴沈曾植为总纂，纂修《浙江续通志》。^②由于续通志实际纂修的时间并不长，最终未竟其业，兼之其间人事纷纭，书稿及相关文献散佚不少，故而目前相关研究成果较少。检寻此前研究，主要聚焦于志书纂修始末和通志稿的体例内容，研究范围相对较窄。对于通志局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人事结构及其政治文化立场、起讫间涉及的重要历史事件、撤销后《浙江续通志》稿刊藏流布等诸多情形，迄无专文讨论。笔者不揣浅陋，以本文着重探讨民国浙江通志局设立的原因、通志局人事情况及其进退出处，借此以窥清末民初浙江乃至全国政教学术迁变之一斑。

一 通志局的缘起

检寻此前有关研究文章，似乎尚无人留意民国浙江通志局设立原因，一般都是泛泛归因于纂修乡邦志书的热忱。然而这种热忱，浙江可以有，他省也可以有；民国可以有，其前其后也可以有，并不能成之为民国浙江设局修志的真正理由。据笔者所翻检1914—1923年间报纸、笔记等各类文献，可以看到，民国初年浙江通志局的设立，在横向行政区域之间，有兄弟省份的相互唱和；在纵向行政级别上，有中央政府鼓励倡导。这两方面内容，又都归因于鼎革之际的政治纠葛、学风迁变及士绅出处。

首先，当时浙江之设通志局，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浙省人文萃集的结晶。应该看到，在清末民初，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一股地方志的纂修热潮。浙江之外，黑龙江、广东、江苏、福建、河南、湖北、陕西、贵州、甘肃等省纷纷设立通志局^③，其中黑龙江、广东、湖北、陕西、江苏5省与浙江接踵开局修志，所以浙江的设局修志，放在全国背景下进行考察，可说是风云际会的时事之作。上述这种一时间“风起云涌”的修志热潮，可能与当时的时代风气和学风变化有重要

^① 名义启动和实际启动相隔时间较长，此据《结束浙江通志局追加十一年度经费案》之说，参见《申报》1923年4月26日，第7版。

^② 由于最终未能成书，故这部志书的名称众说不一。参见《申报》1920年1月24日第8版所载“即定名为《浙江续通志》”。

^③ 此处只统计民国前期开设通志局（馆）的省份。实际上在民国中后期，又有一次大规模的省志、通志开馆纂修。

关系。关于这一点，张升《民国时期方志搜求热考述》有过精辟论述：“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十分注重‘民史观’，关注民生，关注下层社会生活。这种史学思想的兴起，为方志的利用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因为中国古代方志蕴含有非常丰富的涉及下层社会生活的历史资料，而且具有连续性与广泛性，是其他史料所无法取代的，无疑能符合学者学风转变的需要……袁同礼在前引《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序中说：‘近今学风丕变，文史道分，凡著述之可资探讨者，不以其辞之不雅驯而轻之，于是学者渐以读方志相倡’……各省通志馆（局）与中央内政部对方志的搜求，主要是针对新修志书而言的。从1914年开始，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各地修志，形成了民国初期的修志热。”^①这段话讲的是时代风气和学风的变化，对于民初修志热潮兴起起到了思想上的助推作用。而要论通志局能够设立的直接理由，笔者以为应当注意到当时设立的清史馆和国史馆。民国成立后不久，国内很快发起继任修史的动议。胡汉民、黄兴等联名呈请成立国史院，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发挥梁启超的说法，认为“概观中国前史，春秋史记而外，多一人一家之传记，无一足称社会史，可以传当时而垂后世者……多未能发挥民族之精神……若藉为民国之借鉴，犹南辕北辙，凿枘不能相容”；二是认为应当详细记载民国创业的“艰巨挫折，起蹶兴蹶，循环倚伏”，以便“彰前烈而诒方来，正史裁而坚国本”^②。差不多与国史院之议同步，袁世凯就大总统位后，在民国3年初授意国务院提出设立清史馆的计划，理由是：“大清开国以来，文物粲然，治具咸飭……洎乎末叶，孝定景皇后尤能洞观世运，俯察舆情，宣布共和，与民更始。用能成法、美文明之治，洵足追唐、虞揖让之风……惟是先朝纪载，尚付阙如，后世追思，无从观感。及兹典籍具在，文献未湮，允宜广召耆儒，宏开史馆，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③嗣后，清史、国史两馆相继成立。

结合清史、国史两馆馆员名录和职司来看，当时两馆与浙省及其他各省通志局（馆）之间存在着一种若隐若现、草蛇灰线的关联。像清史馆所聘总纂沈曾植、缪荃孙，总修兼总纂劳乃宣、陶葆廉，协修张尔田，校勘兼协修叶尔恺等人，刚好也是浙江通志局的骨干；缪荃孙同时还参与《江苏通志》纂修。国史馆所聘协修宋育仁，曾充任当时四川通志局总纂；国史馆主要成员之一柯劭忞，同时又在清史馆供职，并在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歿后担任代馆长。而清史馆、浙江通志局的劳乃宣，又与国史馆诸人声气相通，等等。诸如此类交结缘附的人物关系，很值得关注。

同时，从当时各类报刊、档案记载来看，袁世凯当政时及其歿后北洋政府早期的清史馆、国史馆曾面向全国征集各省通志及各县方志，在客观上推动各省纂修通志的形势发展。国史馆在征集各地方志之外，似乎还负有统筹指导各省通志的职能，这大约是由于国史与方志均属当代修史、业务范畴相通的缘故。此外，民国5年（1916）陕西巡按使吕调元《奏筹设陕西通志局情形折》说：“上年已奉明令纂修清史，各直省通志不惟备职方之掌故，尤足供史馆之取裁。及早成书，自觉事半功倍。迟之又久，益难求献征文。故臣莅陕以来，每接见绅耆，即令将从前已修未修之稿，设法搜罗……”^④说明清史馆与国史馆都在推动各直省纂修通志上发挥作用。由此观之，袁氏当国前后时段，清史馆、国史馆下及各省通志局，表面看起来似乎各司其事，内地里却

① 张升：《民国时期方志搜求热考述》，《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② 逸雪：《三十年来国史馆筹备始末记》，《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8期。

③ 熊希龄等：《国务总理熊希龄各部总长等呈大总统国务会议议决特设清史馆延聘专员分任编纂请鉴核批示施行文并批》，《政府公报》1914年2月5日，第15页。

④ 《政府公报》1916年3月24日，第18—19页。

形成一个联系颇为紧密的体系。一是中央层面的两馆对地方通志局有一定统摄作用，两馆征集方志客观上也推动了各省通志纂修；二是中央两馆和地方通志局互通声气、互为援应，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圈子中的人物之间，存在师友、姻亲、同年、同乡等密切的关联纽带，他们出此入彼、援应唱和，表现出典型的清末遗民特色。然而这样一来，清史、国史两馆的成立，以及各地搜集、普修方志热潮的实际发动，其政治和学术上的崇尚就与黄兴等人初始的倡议大相径庭了。

拿浙江通志局来说，《申报》说浙江通志局“内部办事人员，局设杭城，多驻沪上”^①。“多驻沪上”正是对浙江通志局人员乃至民初江浙遗老遗少的形象描绘。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清王朝土崩瓦解，战事和动乱迅速蔓延全国。清末官绅惶惶无以保其首领，逐渐结队成群地避居国内各大租界，尤以北青岛、南上海两大集群最为典型。当时上海租界规模最大、文化包容性最好、安全性较高，很快成为遗老遗少的首选避难所。浙江通志局总纂沈曾植，辛亥后避居上海，曾经赁住直隶路、麦根路、威海卫路等处。浙江通志局的主要成员，喻长霖、朱祖谋、吴庆坻、章梲、金蓉镜、叶尔恺、刘承幹等也都长年避居上海。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他们以登门拜访、私酌、会餐、结社、出游、书函往来等方式商议通志纂修方面的问题，如非必要情况，很少离沪赴杭。1915年，浙江通志局正式启动时，提调^②徐定超等人就是临时赴杭。当时《申报》报道：“兹悉修志提调徐班侯暨分纂金甸丞等，业于前晚由沪乘特别快车来杭，侨寓城头巷洋油认捐公所。”^③寓居上海的这些遗民，以结社、诗文酬唱等方式联络集聚，抒发亡国之慨。浙江通志局员中，总纂沈曾植是清室遗臣的中坚力量。“辛亥之后，清室遗臣，居处分两大部分……一为上海，瞿鸿禨曾任军机大臣，位最高，沈子培、李梅庵则中坚也。”^④朱祖谋作为清室老臣，辛亥后避地上海，拒不出仕，曾赴天津以君礼参拜废帝溥仪，最后卒于上海。章梲在清亡前就拒绝参加“经济特科”而固执地以科甲为正途，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翰林。他在所学与出处上颇为徘徊，虽能接受一些西学，但仍坚持旧学为立身之本。宣统逊位时，章梲曾欲赴水殉国。提调喻长霖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榜眼，他在撰文讨论续修《四库全书》宗旨时就旗帜鲜明地表示：“今海宇大通，群言庞乱，后生小子，震于泰西富强之说，危言日出，大道将歧。非续编书目，明定宗旨，排斥邪说，不足以靖群议之嚣，而齐一天下之耳目。”^⑤吴庆坻、劳乃宣等更是积极支持复辟，劳乃宣发表《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先后为清室和袁世凯称帝张目，引起舆论哗然。沈曾植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亡入北平租界避祸，悬惴不定之际曾写信嘱以通志局之事托付吴庆坻，一部分原因当是看中了吴庆坻和他心意相通的超社背景。陈三立在《清故江苏候補道庞君墓志铭》当中说：“当国变，上海号外裔所庇地……四方士大夫雅儒故老，亦往往寄命其间，喘息定，类摭其忧悲愤怨，托诸歌诗，或稍缘以为名，市矜宠。”^⑥这段话也可以说是对当时通志局情形的形象描绘。当时他省通志局的情形和浙省似乎多有相仿，如江苏通志局就是“所首选者，皆南菁门人”^⑦。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如鲁迅所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清廷，建立民

① 《杭州快信》，《申报》1919年5月3日，第7版。

② 笔者按，通志局行政事务负责人。

③ 《省通志局之开幕》，《申报》1915年8月15日，第7版。

④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第137页。

⑤ 喻长霖：《敬陈管见呈》，《政治官报》1908年8月12日，第4—5页。

⑥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86页。

⑦ 南菁就是王先谦。参见羊列荣：《诗书薪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04页。

国，但社会经济、文化基础未变，特别是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士绅阶层仍然是各地的权势集团，他们执掌话语权，维持社会秩序，占据思想文化阵地。中国传统士大夫，无不以修史立言为己任，因此当设局立馆修史纂志之时，以浙江通志局为代表的士绅耆旧，就纷纷打着修史明志的旗号，出入史馆志局，以“兴废继绝”为己任。这是社会文化层面的原因。

另一个更加重要也更加直接的原因，是袁世凯以及北洋政府的政策。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积极巩固自己的地位，压制革命党特别是刚刚在南方成立的国民党，谋划恢复帝制。这就要求他在加强兵权的同时，还需要操控舆论、培养人望。他一方面策动政界和文坛的复古运动，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制造著名的“尊孔复古”事件，通过颁布《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等一系列手段，在全国掀起复古的浪潮。另一方面，积极延揽清室旧臣，在重要位置上安排耆旧，收拢士心以为己用，达到排斥革命党人的目的。当时劳乃宣描述袁世凯的行为，说他“于皇室，初似不甚崇隆，继乃异常捧戴”^①，可谓一针见血。清史、国史和各省通志正是在袁世凯这种以复古文事粉饰军政的策略下开局。徐一士在《〈清史稿〉与赵尔巽》中明确指出：“世凯之设馆修史，本含有藉是延揽胜朝遗老、山林隐逸之用意，犹之清初修明史故智。”^②当时《盛京时报》也说：“袁大总统对于海内硕学鸿儒及前清时代贵官大僚，皆委人敦请其晋京。”^③浙江通志局中缪荃孙、张尔田等都直接或间接得袁氏礼遇，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浙江通志局是由袁世凯的亲信浙江都督朱瑞和巡抚使屈映光主持设立，通志局成员的聘任，也都经朱、屈首肯。《项士元年谱》中曾记载：“1915年（民国四年五月），陆勉侷太史（懋勋）聘予任浙江征书处编辑”^④，陆懋勋就是屈映光的秘书。这样一来，社会文化环境和军阀政策声气相通、契合无间，促成了浙江通志局等局馆的创办。

由此，笔者认为，民初浙江通志局是在当时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力主复古、延揽士绅的政策推动下，在全国掀起方志热潮的学术背景下，在清室遗臣的主动参与下成立，是清末民初的时势所造就。通志局成员均为耆旧帝党的这种思想主张和学术背景，对此后纂修的续通志稿产生深刻影响，直接导致其被后来研究者视为无甚新意、延续旧体志书的守旧之作。

二 通志局成员的出处

中国历史上，历代前朝遗民的出处都是一个热点话题，不奉新朝正朔的遗臣在后半生中往往面临两难选择。清末民初的浙江通志局员，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他们在不屈二姓的夷齐操守和失节出山的内疚神明之间如何自处，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特别是较之宋元和明清之际，清末这个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以浙江通志局为代表的这些遗老遗少进退出处间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对于中国文化走向的参照性也更强。

讨论浙江通志局人员的出处，先要明确通志局人员组成情况。据查，当时通志局主要纂修人员的聘任书虽然统由浙江巡按使公署签发，实际上主要出自沈曾植的荐举甚至安排。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通志局的分纂、收掌及庶务人员，似乎是由总纂和提调直接选任，并无巡按使公署的

① 劳乃宣：《印行正续共和正解跋》，《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331—332页。

② 徐一士：《〈清史稿〉与赵尔巽》，许师慎：《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下册，第626页。

③ 转引自伏传伟：《新朝与旧主的抉择——清史馆设立缘起与赵尔巽的就任》，《学术研究》2006年第5期。

④ 转引自陈继达主编：《监察御史徐定超》，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73页。

聘书。现存的史料档案和报纸记载中尚未看到官方明发的通志局人员名录；从相关人员的年谱、日记中来看，还存在有些人实际参与纂修事务却没有署名传世的情况；加之通志续修数年间，应该还存在有人员更迭的情况，故民国浙江通志局全部的成员名单，从目前来看，恐怕很难考证详明。而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名录，前后多参差不齐，颇有龃龉。据笔者考证，其中有非常明显的错讹之处。比如民国时的文献记载中，已经出现将沈曾植领衔的浙江通志局和多年后余绍宋执掌的浙江通志馆混称的现象，致使局馆人员错进错出，变成前后相连的一件事。后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以讹传讹，差错愈多。^① 故为求确凿，本文采取保守态度，所讨论通志局人员范围，以洪焕椿《浙江方志考》和当时《申报》所载为准，即：嘉兴沈曾植，归安朱祖谋，钱塘吴庆坻、张尔田，秀水陶葆廉、金蓉镜，宁海章梈，仁和叶尔恺，海盐朱福清，海宁王国维，吴兴刘承幹，另有黄岩喻长霖和永嘉徐定超先后任通志局提调。^②

如上一节所述，这些通志局成员多系清室旧人，清亡后他们多数避居上海租界，佯狂遁世、不食周粟，以表示对新时代的抗拒和怨愤。但是与宋元、明清之交比起来，此时通志局的遗民们显然面对着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清亡并不同于元之代宋、清之替明那样看起来似乎是更精致的正统文化被相对落后的异族文化所取代，并由此激发出中原士人亡国亡天下的故国情怀。清亡甚至都不能说是传统意义上的朝代更迭，而是传统农耕礼乐文化的破灭。清廷自同光以来，兴洋务、废科举，变法立宪，其实已经默认了传统文化难以自救这一事实，而实际上这种认知在清末已经广为传播，优秀士绅中甚至已成为共识。所以通志局的遗民，一面抱着对生于兹、长于兹的旧朝的依恋，抱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执念；一面也在痛苦和排斥中或清醒、或依稀地看到，清室之亡、民国之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家国之变，而是新旧交替的必然结果，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选择。所以，他们中间一些人虽然保皇，却并不抗拒变法维新。这种半睡半醒、苍凉彷徨的心态与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的陆沉之慨有着很大的不同。而民国与清室的交替，由于袁世凯的主导，采用了南北议和、清廷逊位谕旨的协议形式，这就有意无意地掺入了一种禅让的意思，使新立之民国与逊位的旧朝间呈现出某种暧昧不明的关系。兼之袁世凯以清室老臣的身份继大总统位，又积极延聘故旧，尊孔复古，这对汲汲于复国的通志局遗民们来说，不免更增况味，让他们对民国政权“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故老子遗的这种心态，师清初之故智，开史馆、设志局，造成一种清臣修清史的模糊印象，尊崇优容清室旧人。加上前朝又有顾炎武以“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之义支持万斯同入明史馆的先例，这些遗民在出入之间就更少一份顾虑而多了一份从容。身兼清史馆、通志局两份职差的张尔田就说：“东观《汉纪》即当世所修，何嫌何疑耶？”^③ 再进一步看，如果说袁氏与北洋的这种优容延揽，虽足以动人心，却仍难消除节操之议的话，那么接受地方上的聘请进出志局，相较于进出史馆，贰臣的味道就更淡一层。毕竟，入志局不同于进入清史、国史馆这种国家层面的机构，入史馆无论如何自解，终究都还是有事“新朝”之嫌。志局相对来说，官方的味道更淡一些，犹可以为乡邦纂辑文献为说，这正是中国传统文人一直津津乐道的造福乡梓之举。故而与入清史、国史馆相比，既不容易引来物议，又可聊以自解。

① 笔者按，此非本文主旨，兹不详论。

② 参见洪焕椿：《浙江方志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页；《省通志局之开幕》，《申报》1915年8月15日，第7版；《浙省修志之人物》，《申报》1915年8月18日，第7版。

③ 张尔田：《史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86页。

沈曾植在光绪朝曾和沈曾桐、陈炽、盛昱被视为四大公车（文廷式、王懿荣、张謇、曾之撰）之后的帝党骨干。强学会组建后，沈曾植和文廷式、沈曾桐、陈炽四人任总董，与杨锐一起选编洋务书。据康有为的说法，1888年他第一次上书时，黄绍箕、沈曾植“实左右其事”^①。先前如此激进的维新派，清亡之后却与革命党人划界分明。沈曾植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说：“世岂有出世于未乱之先者，乃入世于大乱之后耶？”^②立场十分明确。赵尔巽曾找到沈曾植，有意让他出任清史馆总纂，沈曾植最终拒绝了。关于此事，缪荃孙的日记留下了更加丰富的细节，据他所记，这期间沈曾植曾向缪荃孙借阅清史馆条议方案，说明他表面上虽拒不出仕，内心却并非无动于衷。可是他把条议方案寄还缪荃孙时，却有意把它揉烂了，“子培寄开馆议稿来，已揉烂不堪矣”^③。这些细节，可以使我们约略窥见沈曾植内心之一斑。更值得玩味的是，清史馆之事后不过数月，沈曾植却欣然接受了续纂浙江通志的邀约，主持开局招贤。为此，他曾写信给吴庆坻：“偶繙《亭林年谱》，辞史馆而就山东通志局，以为鄙解嘲也。拙手任禾，公能任杭否？”^④前贤顾炎武的出处，无意间竟成为200余年后清室子遗聊以自宽之辞：出仕新朝政坛是为不义，但投身文化、使先王之业赖斯人而不坠，则是当仁不让之举。这固然是比较正面的说辞，但之所以师明末故智、以“半出山”形式变相出仕，经济压力恐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朱兴和对清室遗民的经济状况作过比较整体的论述。据他考证，沈曾植在上海“一直是赁屋而居”，而且租的房屋“都比较仄逼”，生活条件很恶劣，因此造成家人纷纷病倒和病逝。沈家女儿出嫁、儿子续弦，都需变卖藏品和借贷。沈曾植一度负债较重，不得不向亲友求援，甚至屈膝于自己深恶之人。在陈兴和笔下，通志局员章棫的境况较之沈曾植更为不济，以至于陈兴和认为，章棫北上追随溥仪，更多是为了得到一份俸禄，陈兴和评价说“他们的困窘有时候超乎我的想象”^⑤。

陈兴和描述的这种情况，其实当时直接或间接参与通志局事务的学者已经明白承认。王国维作为直接参与者，对情况一定非常熟稔，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年（1920年）家用当比去年稍少，而所入较丰，浙江通志局月送四十元……足资贴补。然欲稍行储蓄以为汝二弟婚费并海宁修屋之用，恐尚不能多储”^⑥，除了说明自身对通志局款的看重外，他还就总纂沈曾植对通志局款的依赖作了详细介绍。沈曾植居沪，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犹太富商哈同处谋职，据王国维的日记中透露，沈曾植认为哈同为人“刻薄倾险”，“为善不足，为恶有余”，但无奈居沪后家境比较拮据，既要靠在哈同处支取薪水度日，又要借住哈同的房子，所以对通志局的收入十分倚重。王国维描述道：“好在《通志》事目下尚可敷衍，乙老云今年经费尚未全有着落，而商务股票尚可贴补，总可支持一年，此一年中再行设法。惟小儿等不能入其学堂，仍旧自课，长儿如何就学，再须设法耳。”^⑦这种境况下，或许部分与修者还可以固持乡邦之情怀，但寄食者众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王国维1917年致书罗振玉说：“永居上海二年，于此间社会情形乃稍详悉，无论公私皆腐败颓废至无可言。如吴下曹君者，蒋孟平延之校书，乃终年未有一字。编《通志》者亦大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120页。

② 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第395页。

③ 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756页。

④ 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410页。

⑤ 朱兴和：《现代中国的斯文骨肉——超社逸社诗人群体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161—165页。

⑥ 房鑫亮：《王国维书信日记》，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505页。

⑦ 房鑫亮：《王国维书信日记》，第84—85页。

半如是。”^① 胡思敬在写给沈曾植的信中更是直言不讳：“贵省志局，乡人依以谋食者不少，未知何时可以竣事？闻冯梦老亦被苏局牵率而出。委蛇处乱道固宜，然非独为一邦文献计也。”^② 又，据当时通志局书记、校对陈彬龢的回忆，他承喻长霖关照进通志局做事，日常就是随喻长霖在西湖边上浙江图书馆读古书、临碑帖，据他自述是“三年中从无一日间断”，喻长霖本人系统读完浙图馆藏《四库全书》子部。后来陈彬龢因为“通志局的事很闲空”，考进之江大学继续攻读。^③ 这些都是历史遗留的碎片化细节，虽不足以窥当时《浙江续通志》纂修之全貌，但还是可以看出当时通志局在人事上的复杂情形和续纂不尽如人意之处。当年《申报》用“旷日持久之通志局”^④ 这样的口吻进行报道，应该是含有一定批评成分在其中。

余 论

从现存文献来看，清代自咸丰晚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后，朝野上下就开始了系统的思考和改革，于是有同治年间的兴办洋务。这种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潮，到了光绪年间愈益激荡，终于酿成戊戌变法和预备立宪。然而数十年间，虽然各方面思考越来越深刻，改革愈演愈激烈，但即使李鸿章、张之洞、曾纪泽、张荫桓等在当时深通中外之事的干才，思想上仍不能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桎梏，所以从同光之际留存的文献资料上，明显可以读出朝廷上许多优秀汉臣开始产生大厦将倾、回天乏术的末世之感。当时第一流人才尚且如此，遑论其余。陈寅恪曾描述这种状态：“凡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⑤ 这就不难理解，在清末民初社会鼎革之际，士大夫阶层身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破灭之境。所以，在这种两千年未有大变局之下，不论是政治还是文化上的事务，都必然呈现出不寻常的状态，往往是在思想摇摆、政治动荡、社会混乱、命运无常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扭曲前行，笔者以为，这应当是我们理解、讨论民国浙江通志局的基本底色。从历史“同情”^⑥ 的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民初浙江设局修志的复杂动机，不难理解通志局员出处之间彷徨固持对于续通志稿所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笔者以为，成于乱世的《浙江续通志》稿可谓弥足珍贵，探讨这部书稿纂修之得失，确有益于对其之后方志文化研究的开展；但另一方面，如能以更广阔的视野，结合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人物等各方面因素，从多个角度充分讨论它们与方志纂修的关联与互动，或能拓宽方志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思考和理解历代方志之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规律。

（作者单位：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房鑫亮：《王国维书信日记》，第293页。

② 胡思敬：《退庐全集·笈牍奏疏》，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552页。

③ 参见陈彬龢：《如何读书》，李公朴：《读书与写作》，读书出版社，1936年，第156页。

④ 《申报》1919年3月31日，第7版。

⑤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王国维先生全集·附录》，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第5541页。

⑥ 此指历史研究的“同情”论。